



汉译人类学名著丛书

高丙中 主编

SWEETNESS AND POWER

甜与权力

——糖在近代历史上的地位

〔美〕西敏司 著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汉译人类学名著丛书

甜与权力

——糖在近代历史上的地位

〔美〕西敏司 著
王超 朱健刚 译

商务印书馆

2010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甜与权力:糖在近代历史上的地位/[美]西敏司著;
王超,朱健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汉译人类学名著丛书)

ISBN 978-7-100-06262-6

I. 甜… II. ①西…②朱…③王… III. 糖—商业史—研
究—世界—近代 IV. F768.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96224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汉译人类学名著丛书

甜与权力

——糖在近代历史上的地位

[美]西敏司 著

王超 朱健刚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6262-6

2010年5月第1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0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7 1/4

定价: 32.00元

汉译人类学名著丛书

总序

学术并非都是绷着脸讲大道理，研究也不限于泡图书馆。有这样一种学术研究，研究者对一个地方、一群人感兴趣，怀着浪漫的想象跑到那里生活，在与人亲密接触的过程中获得他们生活的故事，最后又回到自己原先的日常生活，开始有条不紊地叙述那里的所见所闻——很遗憾，人类学的这种研究路径在中国还是很冷清。

“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现代民族国家都要培育一个号称“社会科学”（广义的社会科学包括人文学科）的专业群体。这个群体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历史时期无论被期望扮演多少不同的角色，都有一个本分，就是把呈现“社会事实”作为职业的基础。社会科学的分工比较细密或者说比较发达的许多国家在过去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发展出一种扎进社区里搜寻社会事实，然后用叙述体加以呈现的精致方法和文体，这就是“民族志”（ethnography）。

“民族志”的基本含义是指对异民族的社会、文化现象的记述，希罗多德对埃及人家庭生活的描述，旅行者、探险家的游记，那些最早与“土著”打交道的商人和布道的传教士以及殖民时代“帝国官员”们关于土著人的报告，都被归入“民族志”这个广义的文体。这些大杂烩的内容可以被归入一个文体，主要基于两大因素：一是它们在风格上的异域情调（exotic）或新异感，二是它们表征着一个有着内在一致的精神（或民族精神）的群体（族群）。

具有专业素养的人类学家逐渐积累了记述异民族文化的技巧,把庞杂而散漫的民族志发展为以专门的方法论为依托的学术研究成果的载体,这就是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科学的民族志”。人类学把民族志发展到“科学”的水平,把这种文体与经过人类学专门训练的学人所从事的规范的田野作业捆绑在一起,成为其知识论和可靠资料的基础,因为一切都基于“我”在现场目睹(I witness),“我”对事实的叙述都基于对社会或文化的整体考虑。

民族志是社会文化人类学家所磨砺出来的学术利器,后来也被民族学界、社会学界、民俗学界广泛采用,并且与从业规模比较大的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结合,发展出宗教人类学、政治人类学、法律人类学、经济人类学、历史人类学、教育人类学……

人类学的民族志及其所依托的田野作业作为一种组合成为学术规范,后来为多个学科所沿用,民族志既是社会科学的经验研究的一种文体,也是一种方法,即一种所谓的定性研究或者“质的研究”。这些学科本来就擅长定性研究,它们引入民族志的定性研究,使它们能够以整体的(holistic)观念去看待对象,并把对象在经验材料的层次整体性地呈现在文章里。民族志是在人类学对于前工业社会(或曰非西方社会、原始社会、传统社会、简单社会)的调查研究中精致起来的,但是多学科的运用使民族志早就成为也能够有效地对西方社会、现代社会进行调查研究的方法和文体。

作为现代社会科学的一个主要的奠基人,涂尔干强调对社会事实的把握是学术的基础。社会科学的使命首先是呈现社会事实,然后以此为据建立理解社会的角度,建立进入“社会”范畴的思想方式,并在这个过程之中不断磨砺有效呈现社会事实并对其加以解释的方法。

民族志依据社会整体观所支持的知识论来观察并呈现社会事实,对整个社会科学、对现代国家和现代世界具有独特的知识贡献。中国古训所讲的“实事求是”通常是文人学士以个人经历叙事明理。“事”所从出的范围是很狭窄的。现代国家需要知道尽可能广泛的社会事实,并且是超越个人随意性的事实。民族志是顺应现代社会的这种知识需要而获得发展机会的。

通过专门训练的学者群体呈现社会各方的“事”，使之作为公共知识，作为公共舆论的根据，这为各种行动者提供了共同感知、共同想象的社会知识。现代社会的人际互动是在极大地超越个人直观经验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展开的，由专业群体在深入调查后提供广泛的社会事实就成为现代社会良性化运作的一个条件。现代世界不可能都由民族志提供社会事实，但是民族志提供的“事”具有怎样的数量、质量和代表性，对于一个社会具有怎样的“实事求是”的能力会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社会需要叙事，需要叙事建立起起码的对社会事实的共识。在现代国家的公共领域，有事实就出议题，有议题就能够产生共同思想。看到思想的表达，才见到人之成为人；在共同思想中才见到社会。新闻在呈现事实，但是新闻事实在厚度和纵深上远远不够，现代世界还需要社会科学对事实的呈现，尤其是民族志以厚重的方式对事实的呈现，因为民族志擅长在事实里呈现并理解整个社会与文化。这是那些经济比较发达、公共事务管理比较高明的国家的社会科学界比较注重民族志知识生产的事实所给予我们的启示。

在中国现代学术的建构中，民族志的缺失造成了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的许多缺陷。学术群体没有一个基本队伍担当起民族志事业，不能提供所关注的社会的基本事实，那么，在每个人脑子里的“社会事实”太不一样并且相互不可知、不可衔接的状态下，学术群体不易形成共同话题，不易形成相互关联而又保持差别和张力的观点，不易磨炼整体的思想智慧和分析技术。没有民族志，没有民族志的思想方法在整个社会科学中的扩散，关于社会的学术就难以“说事儿”，难以把“事儿”说得有意思，难以把琐碎的现象勾连起来成为社会图像，难以在社会过程中理解人与文化。

因为民族志不发达，中国的社会科学在总体上不擅长以参与观察为依据的叙事表述。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在运作中所需要的对事实的叙述是由文学和艺术及其混合体的广场文艺来代劳的。收租院的故事，《创业史》、《艳阳天》，诉苦会、批斗会，都是提供社会叙事的形式。在这些历史时期，如果知识界能够同时也提供社会科学的民族志叙事，中国社会对自己面临的问题的判断和选择会很不一样。专家作为第三方叙事对于作

为大共同体的现代国家在内部维持明智的交往行为是不可缺少的。

民族志在呈现社会事实之外,还是一种发现或建构民族文化的文体。民族志学者以长期生活在一个社区的方式开展调查研究,他在社会中、在现实中、在百姓中、在常人生活中观察文化如何被表现出来。他通过对社会的把握而呈现一种文化,或者说他借助对于一种文化的认识而呈现一个社会。如果民族志写作持续地进行,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在文化上的丰富性就有较大的机会被呈现出来,一度被僵化、刻板化、污名化的文化就有较大的机会尽早获得准确、全面、公正的表述,生在其中的人民就有较大的机会由此发现自己的多样性,并容易使自己在生活中主动拥有较多的选择,从而使整个社会拥有各种更多的机会。

中国社会科学界无法回避民族志发育不良的问题。在中国有现代学科之前,西方已经占了现代学术的先机。中国社会科学界不重视民族志,西洋和东洋的学术界却出版了大量关于中国的民族志,描绘了他们眼中的中国社会的图像。这些图像是具有专业素养的学人所绘制的,我们不得不承认它们基于社会事实。然而,我们一方面难以认同它们是关于我们社会的完整图像,另一方面我们又没有生产出足够弥补或者替换它们的社会图像。要超越这个局面中我们杂糅着不服与无奈的心理,就必须发展起自己够水准的民族志,书写出自己所见证的社会图像供大家选择或偏爱、参考或参照。

这个译丛偏重选择作为人类学基石的经典民族志以及与民族志问题密切相连的一些人类学著作,是要以此为借鉴在中国社会科学界推动民族志研究,尽快让我们拥有足够多在学术上够水准、在观念上能表达中国学者的见识和主张的民族志。

我们对原著的选择主要基于民族志著作在写法上的原创性和学科史上的代表性,再就是考虑民族志文本的精致程度。概括地说,这个“汉译人类学名著丛书”的入选者或是民族志水准的标志性文本,或是反思民族志并促进民族志发展的人类学代表作。民族志最初的范本是由马林诺夫斯基、米德等人在实地调查大洋上的岛民之后创建的。我们选了米德的代表作。马

林诺夫斯基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是最重要的开创之作,好在它已经有了中文本。

我们今天向中国社会科学界推荐的民族志,当然不限于大洋上的岛民,不限于非洲部落,也不应该限于人类学。我们纳入了社会学家写美国工厂的民族志。我们原来也列入了保罗·威利斯(Paul Willis)描写英国工人家庭的孩子在中学毕业后成为工人之现象的民族志著作《学会劳动》,后来因为没有获得版权而留下遗憾。我们利用这个覆盖面要传达的是,中国科学学的实地调查研究要走向全球社会,既要进入调查成本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也要深入西洋东洋的主要发达国家,再高的成本,对于我们终究能够得到的收益来说都是值得的。

这个译丛着眼于选择有益于磨砺我们找“事”、说“事”的本事的大作,因为我们认为这种本事的不足是中国社会科学健康发展的软肋。关于民族志,关于人类学,可译可读的书很多;好在有很多中文出版社,好在同行中还有多位热心人。组织此类图书的翻译,既不是从我们开始,也不会止于我们的努力。大家互相拾遗补缺吧。

高 丙 中

2006年2月4日立春

中文版序言

《甜与权力》于1985年第一次出版。自初版至今，它仍然以英文不断再版，与此同时也被翻译成荷兰文、德文、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土耳其文、日文以及韩文等多个版本。不久的将来，还可以看到它的阿拉伯文版^①。当然特别令我感到欣喜的是，中国的读者们现在能够看到它的中文版了。

对于一本书的著者而言，再也没有比获悉他的作品能被世界各地的读者群体所阅读而更让他感到欣慰了，这些读者往往由于语言的差异，而与该作品无缘。因此，在本书初版之后二十多年的今天，能迎来这一难逢之机与我的新读者们一起分享我在本书中的思考，我更由衷地感到欣喜。

我希望我在书中的所述与中国人民之间有着一种特定的联系。糖在中国的历史——正如在《甜与权力》出版十多年后，穆素洁在其书中所提到的——是意味深长地，甚至是富于戏剧性地与糖在西方的历史相区别。^②近来像马祖达这样的许多研究者，努力把东方和西方联系起来，或是试图使读者了解到在两种历史之间存在的差异与相似之处，在先前不完善的研究中两者被切断了相互的联系。我确信在不久的未来可以看到东方与西方在智识上前所未有的统一，而随着这一统一将出现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

我个人对蔗糖(或是日常英语中所说的“糖”)的兴趣，可以回溯到我在波多黎各岛上早期的人类学田野经验。该岛是美国在加勒比海的属国，最初被美国所控制是在1898—1899年的与西班牙的战争中，至此之后它一直

① 本书的阿拉伯文译本已于2008年出版。——编注

② Sucheta Mazumdar, *Sugar and Society in China: peasants, technology, and the world marke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1998. 此书已有中译本(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

与美国保持着依附关系。那是我第一次在美国本土以外进行田野工作，整个田野调查历时十八个月，当时我住在位于波多黎各南部海岸的一处大型北美蔗糖种植园附近，在那里我研究了一个小型的甘蔗工人社区。^①

那时的我对于蔗糖或是世界上其他任何制糖原料几乎一无所知。只是通过我在调查点的日常经历，随着我与成百个甘蔗工人家庭——他们从事的农业劳动带来了数量巨大的糖的半成品，之后这些半成品被运往美国本土进行进一步的提纯加工——之间友谊的不断增进，我才开始对一个“糖的世界”逐渐产生了概念。

在之后的许多年里，经过在加勒比的的其他的一些岛国上，诸如牙买加，多米尼加和古巴，以及在世界一些其他地方，我对糖有了更多的了解——它的生产、加工以及它对于人们的意义。对我来说，似乎对甜味的体验是我们人类天性中非常普遍的一个层面。然而正如我最终开始确信的，在有的地方人们对它的迷恋确实要逊于其他一些地方。换句话说，一方面人们对糖的食用或许取决于人类普遍存在的对甜味的某些癖性，但是这并不能否认不同的文化在赋予甜味吸引力或是重要性方面有着广泛而丰富的发展。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不同的文化如何对待甜味将可能会是一个极有益的连接点，透过这个连接点可以考察人类行为中自然秉性和社会秉性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可以肯定的是，使人群之间相互区别，一个饶有兴味的方面便是糖在他们的食谱中的位置。

于是，我被激发写作本书，一方面是基于我逐渐对糖的历史本身的了解，这个历史冗长而充满了悲剧色彩；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我知道糖在日常生活中带给了数量众多的人们以巨大的欢乐。毫无疑问我所关注的这个主题有着跨越很长时段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并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渐趋黯淡，尽管通过甘蔗和甜菜所生产出来的蔗糖正在发生着剧变。蔗糖生产和消费带给政府和私人企业的巨大利润已经衰减，然而却并没有消失。在美国，日常出版物仍不断地把甜味的极端重要性编入关于人类事务的史册中。

^① Sidney W. Mintz and others, *The People of Puerto Rico: A Study in Social Anthropology*.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56.

而由于甜味在食物中的角色，它依然保有其社会性、经济性和政治性的显著地位。蔗糖和其他甜味剂出现在人们关于肥胖和健康问题的激烈讨论中。人们对甜味卓显而持久的热爱影响着热带地区甘蔗糖生产者和温带地区甜菜糖生产者们在政治问题上的权重。甜味成为蔗糖生产者和果糖(HCFS)生产者之间竞争性辩论的一环，它成了标示靠不含卡路里甜剂获利与靠富含卡路里甜剂获利的人们之间相互责难之火爆程度的温度剂。它关系到佛罗里达和巴西的环保人士，纽约和巴黎的节食者以及世界各地的营养专家和外科大夫。

然而本书中并未详细地讨论当代世界。其首要的关注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诞生——在时间上我把它(多少有些武断地)划定在大约17世纪中期。至此以后，西方世界的人们，起初只是那些权势者，接着是越来越多的普通劳动人民，开始购买他们的日常食物：值得注意的是，早期被频繁购买的是糖和茶叶这样来自地球另一端的商品，之后他们被相互组合利用来满足在世界中逐渐兴起的无产阶级。它们中的一种是由从属于欧洲的热带岛屿上的奴隶劳动所生产，另一种则来自中国。这些产品标志着向一个世界市场的诞生迈进了重大一步。在本书中我认为西方世界的转型导向了这样一种境域：人们对日常自我的确认根据的是他所购买与所消费的，这对整个世界都具有震撼性的影响。它在最初显得琐碎甚至微不足道，然而这却是一个全然不同的世界萌生的先兆。

在这种意义上，您手中的这本书并非关于糖本身——而是关于资本主义的历史。对我来说我们人类学家能够在思考世界的变化方面受益良多，某种意义上是因为我们这一学科似乎特别有助于理解和解释那些微观的、日常化的、熟悉的以及通常是具体的事物：通过发掘那些生活中平凡事物在宏大历史中的位置，赋予了这些事物以格外的意味，同时也可以使宏大历史本身得到更好的理解。

是的，这是一本写糖(蔗糖)的书，然而我希望它也能帮助读者们去洞悉那个由糖、奴隶劳动以及西方帝国殖民历史的红线所纺就的宏大织体。

西敏司(Sidney W. Mintz)

献给杰琪

满怀爱和感激

致 谢

ix

这本书有着漫长的历史。我在很多年以前就开始为它收集材料,甚至是在并未察觉之时;接着写作也花了不少时间。我从1978年起开始写草稿,那时候我正享受着国家对人文科学的经费资助。我感谢宾夕法尼亚大学人类学系在我在费城期间给予我访问学者的资格;我也感谢威廉·H. 达文波特(William H. Davenport)教授除了作为我的友伴之外还慷慨地将他办公室一半的宝贵空间让给我使用。

1978年春天,由于有了普林斯顿人类学系、克里斯琴·高斯(Christian Gauss)演讲委员会以及他们令人尊敬的主席——詹姆斯·费尔南德斯教授(James Fernandez)和约瑟夫·弗兰克教授(Joseph Frank)的殷勤款待,我才得以在一众有思想的听众那里实验我的一些想法。感谢娜塔莉·Z. 戴维斯教授(Natalie Z. Davis)、斯坦利·斯坦(Stanley Stein)教授和维克多·布朗伯特教授(Victor Brombert)等有洞察力的批评家,他们尽全力在他们的研究领域帮助了我。

1980年和1981年的夏天是在学术界的圣地麦加——大英图书馆度过的。温纳-格伦(Wenner-Gren)基金会及其研究总监丽塔·奥斯蒙德森(Lita Osmundsen)使我的其中一个英国之行成为可能。霍普金斯学院的一位伟大的系主任——已经过世的乔治·欧文(George Owen)博士及他的办公室为我提供了支持另一次英国之行的研究奖金。

对于那些帮助我查找资料的人我怀有特别的谢意,他们帮助我复印材料,将引文、文件、参考文献整理分类,并帮助我打印手写的修订稿。我要特别感谢伊莉斯·莱康普特(Elise LeCompte),在进入研究生院学习以前,她为本书付出的辛勤劳动几乎和我一样多。玛吉·科里格农(Marge Collignon)打印了最终的文稿,她高质量并快速地完成了这项工作。苏珊·罗塞尔·尼尔森(Susan Rosales Nelson)博士高速高效地完成了索引的准备。

下面感谢那些对我表示出无限友善的图书馆管理员们，他们是分别工作在 Van Pelt 图书馆(宾夕法尼亚大学)、大英图书馆、威尔康姆(Wellcome)医学图书馆研究所、燧石(Firestone)图书馆(普林斯顿大学)、巴尔的摩市伊诺克·普拉特(Enoch Pratt) 免费公立图书馆，另外还有最重要的米尔顿·S. 艾森豪威尔(Milton S. Eisenhower)图书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我的感谢之情无以言表。我要对艾森豪威尔图书馆的馆际借阅部的工作人员致以特殊的谢意，他们的勤奋、付出和效率是无与伦比的。

我的很多好朋友在本书的成书过程中都阅读了手稿并对本书提出了不同的批评。在他们之中我必须提到我的同事阿什拉夫·加尼(Ashraf Ghani)教授、西德尼·坎托(Sidney Cantor)博士、弗雷德里克·达蒙(Frederick Damon)教授、斯坦利·恩格曼(Stanley Engerman)教授、斯科特·古根海姆(Scott Guggenheim)博士、汉斯·麦迪克(Hans Medick)博士和理查德·普莱斯(Richard Price)教授。杰拉德·哈格尔伯格(Gerald Hagelberg)先生、卡罗尔·海姆(Carol Heim)教授、基思·麦克莱兰(Keith McClelland)先生、瑞贝卡·J. 斯科特(Rebecca J. Scott)教授、肯尼思·夏普(Kenneth Sharpe)教授、威廉姆·C. 斯特蒂文特(William C. Sturtevant)博士为整部书稿做了大量详细的批注。我甚至没有能够对所有的批注和建议一一作出回应，但是他们对文本的贡献比他们自己意识到的还要大。一位经验丰富的制糖工业流浪者互助社的成员——乔治·格林伍德(George Greenwood)先生给予了我特殊的启发，我对他怀有最深的感激之情。同时，我也要感谢我所在的人类学系的成员，包括教师、工作人员和学生。他们在我们相识的最初十年里的鼓励和支持赋予了“互助合作”这个词以新的意义。我的编辑——伊丽莎白·西夫顿(Elisabeth Sifton)，因她的能力使我敬畏，以她的情点燃了我的热情；我诚挚地感谢她。

如果有人为本书吃了比我更多的苦的话，那一定是我的伴侣——杰奎琳，我所有的爱和感恩的心都要献给她——谨以此书作为我们结婚 20 周年迟到的礼物。

目 录

致谢	1
导言	1
第一章 食物、社会性与糖	15
第二章 生产	31
第三章 消费	81
第四章 权力	151
第五章 饮食人生	184
参考书目	211
注释	224
索引	245

这本书有一个奇特的历史。尽管它是我近期持续写作的产物,但许多内容自我多年来在阅读和研究中点滴积累的浮泛知识和印象。就它的研究对象而言,这本书如同一次回家。因为在几乎整个职业生涯中,我都一直在研究加勒比地区以及该地区热带产品——主要是农产品的历史,这些产品自从加勒比地区被欧洲征服以来就与当地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这些产品并非都起源于新世界;显然地,其中任何一种,甚至包括那些本地产的,在15世纪以前的世界贸易中从未占过一席之地。15世纪以后,这些产品开始为满足欧洲和北美洲的人们而生产,于是我开始对欧洲和北美洲的人们如何成为这些产品的消费者发生兴趣。沿着生产的线索,追溯这些产品在何时、何地变成一种消费品,正是我所说的“回家”的含义。

大部分加勒比海地区的居民,包括美洲印第安人(Amerind)原住民的后代和来自欧洲、非洲和亚洲的移民都待在乡村从事农业。工作对他们来说就意味着在乡村中劳作,对他们感兴趣就意味着对他们的劳动产品感兴趣。由于我曾和他们一起劳作,了解他们喜欢什么,知道他们的生活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形成,因此我不可避免地想知道更多关于糖^①、朗姆酒(rum)、咖啡和巧克力的事情。加勒比人总是和更广大的世界纠缠在一起,因为自

① 在翻译中,我们并没有把书中所有的“sugar”一词直接翻译为汉语的“糖”,这主要是考虑到作者所研究和讨论的对象更多是专指以甘蔗为生产原料的“蔗糖”,尤其是蔗糖生产和消费的历史发展过程。原书中在提到蔗糖的地方,虽然也部分使用了更能直接对应的“sucrose”一词,但也有很多时候用的就是“sugar”。所以如果一概将所有的“sugar”都翻译为“糖”的话无疑会影响到对本书前四章的理解。尤其是作者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也提到了由甜菜生产的糖,这与蔗糖并不能画上等号。译者也考虑过“sugar”的其他译法,例如“白糖”、“砂糖”等,但是在本书前面的章节中有很多部分提到了棕糖、糖蜜、黄金糖浆等等形状颜色各不相同的“蔗糖”。所以斟酌之后才选择了用“蔗糖”一词来翻译前面四章中的多数“sugar”。但必须要说明的是,作者在全书中还是有一些地方是在一般意义上来使用 sugar 一词,例如导言、第一章和第五章的部分内容,尤其是第五章。这些地方使用的“sugar”一词和我们在一般意义上使用汉语“糖”这个词的情形类似,并没有特定的专指。所以在这样的地方,译者选择把“sugar”还是翻译为“糖”。——译注

xvi 1492年以来这个地区便处于帝国控制的纵横交错的网络之中,这一帝国由阿姆斯特丹、伦敦、巴黎、马德里以及其他欧洲和北美的世界权力的中心交织而成。我想,从加勒比的位置看,那些在岛屿社会乡村地区工作的人们不可避免地倾向于看到这样的控制网络和依附关系:恕我直言,他们是从地方生活向上、向外看,而不是向下、向内看。但这种局内人的视角与那些早期观察者们顽固的欧洲视角同样有一些缺陷。在后者眼里,这些更大部分的具有依附性的、外部的、非欧洲的世界只不过是欧洲在边远的、鲜为人知的和有缺陷的地方的延伸而已。那种通过选择某种视角而忽视另一种视角、隔断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联系的观点,因此必然是不完整的。

在加勒比社会的底层工作,一个人会问:这些社会是以什么样的方式与外面的世界和欧洲的世界相互联系,甚至说相互锁定的?在赤裸裸的军事和经济强力之外,还有什么力量维持着这种密切的相互依赖的关系?对应于权力运作方式,利益又是如何流动的?一旦人们希望在细节上弄明白由殖民地供应给大都市的产品的历史,这类问题就有明确的意义。以加勒比地区为例,这类产品长期是,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热带产品,如香料(例如姜、多香果粉、肉豆蔻和豆蔻)、饮料原料(咖啡和巧克力),以及最重要的糖与朗姆甜酒。染料(例如靛青、胭脂树和佛堤树[fustic])曾经十分重要,不同的淀粉、淀粉食品和原基(例如制造木薯粉的木薯,竹芋和西米以及各种泽米属植物)曾经在出口贸易中地位显赫,一些工业原材料(像剑麻)和香精油(像香根草^①)也曾举足轻重,大理石、沥青和石油依然如此。甚至一些水果,例如香蕉、菠萝和椰子也不时地在世界市场上占有相当分量。

但是对于整个加勒比海地区来说,在大多数时候最稳定的仍然是对蔗糖的需求,即使今天受到了其他糖料的威胁,它也仍然保持着自己的地位。尽管欧洲糖的消费的历史并不只是同加勒比地区相关,而全世界的糖的消费一直在稳步增长,也不需要考虑糖来自何方,但是加勒比在这一图景中,xvii 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扮演重要的角色。

^① 香根草,一种印度热带草(岩兰草,香根草属),它带香味的根可以用做香料制造业中的油料。——译注